

游记《奇石》中的“飞散”探究

钱建伟

摘要: 美国记者彼得·海斯勒的新书《奇石》跨越12年,用外来者的眼光描述了来自中国、美国、日本、尼泊尔以及埃及5个国家的24个故事。旅行、迁徙、探寻乃至逃离的人们在文化上同化、被同化,或者形成混合状态。书中所述的各国故事很好地阐释了后殖民研究中的飞散概念,以及作者在无形中流露出的帝国飞散视角;有关中国当今改革变迁中人们的故事亦阐明了“故土飞散”这一概念:处于时代变革中的中国人虽未流落他国,却在故土上同样演绎着背离传统、文化混合以及繁荣衍生的飞散主题。

关键词: 同化;混合状态;帝国飞散;故土飞散

作者简介: 钱建伟,男,讲师,博士生。(浙江传媒学院 大学外语教学部,浙江 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 I712.0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552 (2017) 02-0124-05

英语中的“飞散”(diaspora)一词最早是指犹太人的大流散,离开本国去他国生活和工作,而后泛指任何民族的大移居。追溯其希腊语词源,飞散指“种子或花粉‘散播开来’,植物得以繁衍”。^[1]由此,传统意义上的飞散必是由迁徙、移民等导致,与背井离乡的流亡者有关,叙述其在新旧环境与文化中所面对的文化冲突与混合、对身份的探究以及寻根等概念。流亡者跨越地域、民族,在至少两种文化的夹缝中怀念故土,抑或融入新文化环境,再或在二者中竭力寻求平衡。流亡作家们通过“个人史或是家庭史来写民族史和族群史”^[2]叙述漂泊与苦难,重生与融合。弗拉迪米尔·纳博科夫对俄罗斯的塑造,托尼·莫里森对非洲移民的描述,卡勒德·胡塞尼离开、重回祖国阿富汗又再次回归到美国的“家”中的经历等,都是如此。

作为后殖民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之一,飞散除了关注从殖民地流亡到欧美发达国家的人民外,也关注流向第三世界的欧美“帝国飞散者”^{[1](117)}。理论家们关注飞散的文化性和政治性,讨论流亡者的话语权、自我与他者等概念。无论是讨论殖民者统治的优越感还是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后殖民飞散研究都更具政治性。

然而在当今社会背景下,上述飞散概念仍有其狭隘之处。本文通过细读被美国《华尔街日报》誉为“研究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在中国旅居生活12年的美国记者彼得·海斯勒新书《奇石》,并对其中来自5个国家的故事分析对比,试图说明海斯勒无时无刻不体现于书中的“帝国飞散”视角;同时,本文通过分析书中所述那些生活在故土(从未离开故土,或是离开又回归故土),却在时代变革下同样经历着文化冲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中生活着的中国人的故事,试图对后殖民飞散理论稍作补充,提出“故土飞散”这一概念,这类“流亡者们”没有背井离乡,却同样或怀念过往,或敬畏未来,抑或在摸索中寻求某种出路。

一、帝国飞散:放逐中对美国的再造

飞散向来有传统派(社会学、人类学派)和后现代派(文学、文化研究派)之分。传统派贴近现实,研究飞散群体的类别及特征,而后现代派更注重精神意识层面的飞散探究。根据科恩在《全球飞散:概论》中的传统派分法,飞散群体应包括“受害飞散群(如曾受迫害的亚美尼亚人)、劳工飞散群(因劳务输出而到国外工作的群体)、帝国飞散群(因帝国主义扩张而去第三世界国家的欧洲人)、商贸

飞散群（因贸易、商业活动而到其它国家的商务人士）、文化飞散（如在加勒比地区存在的混合型文化）”。^{[1](116)}在后殖民理论中，这些由前宗主国即欧美国家流向第三世界的帝国飞散人群通过“游记、历史著作或传记等叙述……基于殖民秩序的优越感……或是表达……对受压迫民族的极大同情感，及对西方帝国主义思想的莫大的憎恨感”。^[3]如此定义下的帝国飞散群要么是意图去同化曾经被压迫的民族，要么就是去揭露自身的黑暗面，而和被压迫民族并肩站在一起。作为强势的一方，他们不需要像第三世界飞散群体（或叫前殖民地飞散群体，即由前殖民地国家移居至西方国家的人口）那样面对漂泊与苦难、抉择是否应该铭记故土文化、卑躬屈膝地融入新世界、进行自身身份的重新定位等问题，而是更多地关注他们自己所带来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他们保持自身的优越感，充当本国文化“传教士”的角色；他们主动被第三世界同化，彻彻底底地成为他们所同情的民族中的一员；他们在这种挣扎中逐渐成为“混血儿”。面对这些选择，他们总是掌握着主动权，这一点尤为重要。在当今科技全面联通全球的大环境下，帝国飞散群体体现出更为丰富且复杂的特征，值得进一步对其思索与探究。

海斯勒在《奇石》的序言中提到：“我尽可能地把本地人和外来者的视角融合在一起。”^[4]这其中的“尽可能”包含着尝试与无奈：尝试用公平客观的角度去叙述，不戴有色眼镜，不用作为一个来自发达国家的优越视角去看待他所处国家的人与事，可他又无奈于这种尝试极有可能以失败告终。笔者认为，海斯勒的尝试无可挑剔，但是书中仍随处可见他作为美国人、一个外来者的视角——帝国飞散的视角。他选取的事例、在故事中与人们的对话、他的行为举止都是一种由上往下的优越视角。然而，在中国十多年的生活又让他主动接受被同化，成为一个文化上的混合者。他恰好成为上述的“混血儿”。

《奇石》是一本主要关于中国的书，也包括来自日本、埃及、尼泊尔和美国西部的几个故事。作为驻外记者的海斯勒游历这些国家和地区，以外来者的身份观察，极力采用融合的视角，却无时无刻不显示着其美国国民性。他的身上保留着传统的帝国飞散者的特性。海斯勒1996年加入美国和平队来到中国，然而，对于和平队的指导手册，他却没有什么好感：“美国人对于发展中世界国家的看法相当古板”，^{[4](177)}这些国家或是需要被拯救，或是令人感到恐惧。美国优于这些国家，队员们似乎如若不充当那里的救世主，那就应该对那里的荒蛮落后感到胆战心惊。尽管海斯勒已经认识到这种观点不当，但他还是未能克制自己的优越感。2000年，北京为申办奥运会而在胡同里修建的公共厕所被海斯勒戏称为“奥林匹克卫生间”^{[4](28)}，这种在海斯勒看来极具戏剧性——“仿佛是一道光从奥林匹斯山直接照耀到这条窄小的巷子，随后留下了一座宏伟的建筑”^{[4](15)}。如果考虑到奥林匹克厕所便利的现代化设施，对居住在胡同里的人们生活的改善，早已将这种便利视为寻常的海斯勒应该就不会如此描述了吧。在丹东的旅馆遭遇小偷，海斯勒完全忘记了在美国“谁都不会去追他们”^{[4](394)}的意识，“我使劲地揍他……朝他挥舞着拳头”^{[4](392)}，“我尤其记得自己无与伦比的愤怒，愤怒的程度现在都让我害怕不已”^{[4](394)}。做笔录时面对警察的质疑——为什么似乎很瘦弱的小偷，只顾狂奔而逃，从不还手？海斯勒产生不安：“既然他已经丢下了我的财物，我为什么还会对他一顿猛揍？他为什么丝毫没有反抗？”^{[4](402)}令海斯勒不安的，或许正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外国人的身份对中国底层人们的威慑力。“徒步长城”和“甲骨文”两个故事里，中国人不懂得保护本国文化遗产：没有人潜心研究作为祖国象征的长城，百姓随意毁坏长城遗址；在文革中被迫害的研究甲骨文的陈梦家，甚至差点放弃博大精深的汉字而采用拉丁字母等等。与中国人相反，这些事情里，都有肩负着拯救使命的欧美人出现：日复一日沿长城做徒步野外考察的石彬伦，沿长城“且跑且走了四千公里”^{[4](49)}并成立“国际长城之友协会”的英国地理学家威廉·林赛、编辑陈梦家网站的匈牙利人 Imre Galambos。中国人对本国传统文化的“浅薄意识”被他批驳，欧美人的“执着与睿智形象”也随之树立起来。

中国之外，在尼泊尔从事志愿工作的和平队队员纳吉夫，在落后的山区为当地修建水利设施，利用美国辛苦募捐而来的钱修建学校，从事有机农业。“当地的人们只要一提到他的名字就会泪流满面……

把他看作是恒河之源的湿婆神。老人们一边拧水龙头一边说道“这都是他赐给我们的。”^{[4](56)}来自发达国家的纳吉夫和当地人合作,也会被评价为“这么一个美国人竟敢如此信赖卡纳马嘉这么一个没怎么读过书的人”^{[4](61)}。纳吉夫的父母20世纪70年代从印度移民到美国定居,属于吠舍阶级,但是在尼泊尔,人们只将他看作美国人。他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援助,是伟大的援助之举,却也是优越阶级才能办到的。混迹于日本黑道的美国人杰克·阿德尔斯坦,“扮演犯罪报道记者的角色”^{[4](210)},在险象环生的黑社会里混得如鱼得水,其原因正如黑帮中人所述:“他不用考虑那样的禁忌或者界线……如果他是日本人,现在早就没命了”。^{[4](209)}外来者,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外来者”之牌,总是这些人的护身符。

海斯勒和这些进入他国的欧美人都自愿远离家乡,将自己放逐,他们旅行、工作、融入当地的生活,他们看似在竭力隐去自身的帝国性,却无时无刻不在他们看待当地事物的眼光和他们的行动中体现着他们作为帝国飞散者的优越性。这些记述在书中的故事,时刻暗示着:这是些奇闻,它们与我们欧美国家的事情不同,我们国家的事情恰恰是这些怪事的反面。他们在放逐中不断地重塑祖国形象,实现着对故土帝国的再造。

然而,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帝国飞散者,海斯勒及其记录的帝国飞散群体虽在无意识情况下体现出自身的优越感,但他们又能主动地融入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接受当地同化,模仿并采用当地的方式做事,逐渐将自身塑造为“混血儿”。这从和平队的创建目的中就可可见一斑:“和平队从一开始就被描述成对外事务的帮手,不过他的另一个目的是要培养美国人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4](185)}“它变成了唯一教会美国人抛掉国民性格的政府机构”,^{[4](177)}这些欧美人在异国他乡看着一个个异于自己的他者在自己面前展现,他们努力了解当地,了解即是获知,是明白,在一定的积累之后,这种了解逐渐被内在化,最终在某种情形下,他们的言行便和当地的人们趋于一致。“奇石”一节故事中多次体现了这一点。和平队志愿者麦克·高提格就俨然成为了一个被中国人称赞的喝酒好手,他甚至学会了像四川的农民们那样用牙齿打开啤酒瓶盖,^{[4](182)}即使后来回到美国,成为由哥伦比亚大学负责主办的《亚洲法律》杂志总编辑后,“他脸上依然带着一丝源于中国的表情——略显震惊、不知所措、难以适应”。^{[4](187)}在4次大小交通事故之后,海斯勒完全学会了中国人处理事故的方式。屡次损坏汽车出租公司的捷达汽车之后,他起初的不安与诚心诚意愿意赔款的心态逐渐演变为“我是他们的老顾客”这种中国人惯用的贪图便宜的心态,然后让事情不了了之。原本认为交通事故后应该按正规手续理赔的海斯勒,更学会了像中国人一样“通常在大街上用现金当场解决问题”,^{[4](238)}在大街上讨价还价,气势汹汹,理直气壮。十多年之后,海斯勒载着大量的中国家具回到美国西部落基山小镇,同样回去的,还有他在中国养成的生活习惯和一些思想理念。“我一直不善于提前谋划,在中国生活了多年之后,我的这种习性越发糟糕,因为那里的每个人似乎都活在当下”,^{[4](342)}他更将在落基山偏僻小镇落户视为在实现自己“中国版的美国梦”。^{[4](345)}或许正是从中国人顺从地面对生活的角度出发,美国铀兑湾镇的故事才能被提倡环保与健康的发达国家的人们所理解。环保人士宣称铀污染会引发肺癌等诸多疾病,铀兑湾镇人们却热爱着那里的生活,喜欢户外运动,坚决否认铀会危害健康,即使在被政府强迫搬离之后仍每年回来举行野餐聚会,怀念当年生活的美好。

正如海斯勒在序言中提到的发明了“创造性口吃”的美籍华人牛康民一样,这些帝国飞散者们在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和内在了的异国文化思想中生活着。他们用优越的眼光审视他乡事物,隐约地对那些他们眼中奇怪的事情说着“不”,甚至时不时地充当起拯救他人的使命。但他们对当地文化探究得越深入,也就越容易被同化,进而开始无意识地模仿,直至在某些方面成为当地文化中的一员。外来者的身份和“本地人”的身份相融合,在必要时刻巧妙利用,帝国飞散者们比第三世界飞散者们在自身身份重新定位上更具主动性,他们心甘情愿地成为“混血儿”。

二、故土飞散：飞散理论的纵轴

颠覆传统理论中飞散群体必须是背井离乡的，故土飞散者生活在自己的故土家园，有的甚至从未跨出国门，却同样遭遇多种文化冲击。在科技，尤其是通讯手段如此发达的今天，不同国家民族间的交流更加便捷与频繁。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而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开放程度的增强，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突然大量涌入，对他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造成极大的冲击。他们的生活、精神状态发生巨大而迅速的变化，他们处在本国传统与外来思想的夹缝中，面临自我身份的重新定位。他们被迫跨出本国传统生活几千年来早已设定好的人生轨迹，带着无尽的迷茫重新摸索人生道路。与传统的第三世界飞散群体相比，他们在本国土地上面对着上述种种问题，本文在此将这类人定义为“故土飞散群”。这些人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生活在自己的家园故土，却同传统的飞散群体一样要面对文化冲击、重新审视自我并寻求文化认同出路的现象，这即是本文要提出的概念：故土飞散。

故土飞散可谓对诸多飞散概念的补充，也可以说是飞散概念里的一条纵轴。借用数学上的三维坐标来说明：如果说传统概念里的第三世界飞散群强调人们地域上的流动，是横向的散播，像是在一个二维的平面上平移，关注的只是位置的变化；那么故土飞散研究的则是人们精神、文化以及思想因时间而引起的变化，是历史发展过程中，某一地域的人们因时代变化，不断受外来文化影响而导致的对自身文化的重构。故土飞散就像是三维坐标里的纵轴，为传统的飞散概念引入时间变化的因素。它强调人们在某一既定地域上所遇到的因时代变迁和外来文化冲击而导致的一系列思想、文化上的改变。故土飞散所说的时间，更强调当下与将来，强调当今的全球化背景，它与董明在《飞散的文化和文学》一文中提到的时间性不同：

飞散者的根是文化的根，也是历史的根。许多飞散群体以其民族经历的历史灾难作为力量的凝聚。……在后殖民的世界上，殖民历史的种种创痛回忆幽灵似的随飞散者旅行；飞散者在西方国家的生活经历有时提供条件，促成受压迫情绪复现，以暗恐心理形式出现。^{[4](10)}

董明所述飞散者的“时间性”或“历史”指飞散者的文化根源，是过去的经历，往往是悲惨的、灾难性的苦难经历，强调的是过去的经历对现在的影响。故土飞散强调的时间概念与此不同。故土飞散的“时间”是指现在和将来的时间，注重在外来思想的冲击下，人们或盲目迎新，或失去自我方向，或摸索着寻求平衡的过程。《奇石》这本书中有关中国的故事尤能阐释这一概念。

2011年海斯勒的《寻路中国》出版时，柴静就曾称赞海斯勒写出了我们当今中国人所熟视无睹的中国，以及一种亲切的酸楚感——“那个酸楚就是剧变的实质——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心灵没有归属，不管你知不知觉，承不承认”。^[5]“酸楚”正是处在改革与发展中的中国人内心的真实写照，他们迥异的反应和行动值得人们思考。这种例子在《奇石》中比比皆是。一个个大大的“拆”字给众多北京胡同带来厄运，在急切的现代化进程中，人们摒弃传统，追求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承载了几千年老北京人情味的胡同寿终正寝，人们“毫无反抗地搬走了”，^{[4](25)}他们顺从地忘记过去，麻木地接受着未来，似乎一切都是程式；他们恪守规则，按部就班地生活。极为相似的是三峡库区的移民们，只是多了几分对未来的盲目渴望。大部分人无奈但顺从地接受背井离乡的命运，搬至政府新建的移民住宅区，甚至迁往外省，他们认为新的总比旧的好，因为如果不修大坝，这些贫穷的人们“还得再等上五十年才能够达到现在的水平”。^{[4](141)}对于环境保护、山体滑坡等问题，他们视而不见，只想抓住眼前的机会，“政策经常在变……人们觉得改革是一次机遇。大家都要抓住这个机遇，因为那可能又不会长久”。^{[4](142)}突然看到外面世界的中国人，上到政府有关部门，下至百姓都是盲目的，就如同第三世界飞散者一样，只想瞬间丢掉过去的一切，换上全新的面孔。

类似艾米莉这样的由内地城乡来深圳打拼的年轻人是故土飞散者中的代表。深圳突然间由小渔村

变身为经济特区，人们的精神赶不上经济与物质的爆炸式发展。迅速发展的深圳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来追寻梦想，他们拿到比内地多得多的工资，他们急切、好奇地望向国门之外，被外来文化席卷，甚至连根拔起，致使他们迷茫无措。深圳有着当时相对闭塞的内地所没有的自由与开放，“一帮帮小伙子肆无忌惮地高声交谈，一群群女孩子开怀大笑。很少看到家庭或是小孩。基本上看不见老人。这就是深圳的自由——这里没有陈规，也没有过去，大家都远离家人”。^{[4](112)}这个城市似乎一瞬间洗刷掉了所有传统的束缚，但在突如其来的自由面前，人们又手足无措了，正如艾米莉所说：“人们太忙于赚钱，都不知道该怎么生活”，^{[4](108)}“深圳是一座没有灵魂的城市……每个人都很焦虑——无法找到平静”。^{[4](122)}然而在金钱、感情、毒品、赌博以及性方面，年轻人们又无法摆脱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即便认为深圳比中国其他地方性开放是件好事，艾米莉仍会说：“但不应该越过一定的界线……跟传统道德有关。”^{[4](119)}在深圳的这群人是某种程度上的故土移民，他们虽然离开故乡来到外来思想大量涌入的沿海城市，但他们没有踏出国门、没有直接处在西方文化之中，他们所认为的“来自西方社会”的思想观念并不完全是西方文化，而是一种在本国长久的压抑中生活太久、突然得到自由时产生的无节制释放和混乱。他们在这种混乱中挣扎，既要自由，又对背弃传统的做法诚惶诚恐。与第三世界飞散者相比，他们背负着更沉重的历史传统，他们身在故土，处在自身文化传统之中，在接受外来文化时会受到更大的传统道德束缚。

另有一些故土飞散者，他们踏出国门去学习先进技术并受某些品质的感染，为的是回故土，以一种中国式的创造性的形式发展。他们已经找到平衡，摸索到出路。地处内陆的芜湖市，本没有特色产业、没有自己的品牌，却“通过向外国人学习，但保持控制权的方式快速地建立起自己的工矿企业”，^{[4](302)}充分利用中西方各自的优势，取他人之长，拿来为己所用。“就像学画画。你不可能一开始就画出自己的得意之作——你只得临摹他人的画作”。^{[4](311)}在竞争、学习中，甚至不惜采用一些违规之举，得到国外厂商的设计机密。精明、敢于冒险、拥有进取心的芜湖人（奇瑞汽车公司）最终成为中国最大的汽车出口商。海斯勒写道：“我在中国生活得越久，某些方面就越发让我想起美国。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拥有无止境的乐观和精力……他们一向拥有自命不凡的品质，相信自己能够战胜时间——中国人的这一品质比美国人还要美国化。”^{[4](314)}这种“走出去—引进来—发展自我”的人们是本文故土飞散者的又一特征。他们机智地选取外界文化中可以为我所用的部分，果断拿来，与本土融合，最终塑造出强大的自我。占据地理优势的温州人，眼光一直瞄准国外，他们不仅务实而勤劳，且更具有国际化眼光，甚至“带着诸多美国文化的影子”。^{[4](385)}温州人清楚自身优势，了解国外市场需求，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任何人无需离开大陆，便能在温州发现其与传统计划经济相去十万八千里的诸多东西”。^{[4](385)}当美国人对经济危机产生恐慌的时候，温州人依然表现出中国人特有的顺势而为的心态：“如果全世界都在走下坡路，我们不过是跟着走下坡路而已，那么事情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4](391)}他们不慌不忙，在中外文化的交融中从容淡定、游刃有余。丽水画匠陈美子是另一个充分利用外界资源发展自我的例子。在全球互联网浪潮的影响下，“丽水很难看到外国面孔……城内的国际化面貌却比比皆是”。^{[4](321)}陈美子接收来自海外的要将照片转化成油画的订单，她手中描绘着异国风情，却“从不认为有必要与外部世界发生深层次的关联”。^{[4](327)}作为全球互联网一端的劳动者，她没有受到伤害，更没有迷失方向。她通过市场窥探着零星的、碎片式的遥远的国度，同时将自己的文化信仰与外来文化区分得一清二楚，日子过得舒心静谧。身处故土，通过现代化手段了解外界、获取信息，又巧妙地将外界的资源拿来为我所用，这类人是故土飞散者中最为成功的典范。

三、结 语

“‘奇石’指的是任何形状类似其他物品的石头”。^{[4](172)}飞散者们就似这奇石，在（下转第134页）

(上接第 128 页) 文化交融中被塑造成各式各样的形状。帝国飞散者们无意识地保留优越感的同时, 也会主动接受同化, 为自身构建起混合身份, 在恰当的时刻选择恰当的身份, 周旋于故土、他国。

无需跨越国界, 在当今通讯科技帮助下, 在故土上迎来外国文化冲击的故土飞散者们挣扎于传统与外来文化之中, 有的盲目求新, 有的迷失了自我, 更多的已寻得独特的出路。海斯勒在开罗为此书作序时写到: “我又搬到了一个全新的国家, 开始学习一种全新的语言。有时, 这感觉令我喘不过气来, 有时, 它又让我如归故里。” 他本人就是一粒飞散的种子, 游历各国, 吸收、融合着各种文化, 日益丰盈, 以其特有的方式繁荣灿烂。

参考文献:

- [1] 赵一凡, 张中载, 李德恩. 西方文论关键词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113.
- [2] 张德明. 流浪的缪斯——20 世纪流亡文学初探 [J]. 外国文学评论, 2002 (2): 57.
- [3] 童明. 飞散的文化 and 文学 [J]. 外国文学, 2007 (1): 89-99.
- [4] [美] 彼得·海斯勒. 奇石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 5.
- [5] [美] 彼得·海斯勒. 寻路中国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1.

[责任编辑: 高辛凡]